

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研究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综述

潘 洵 赵国壮

2013年9月13—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日本组织委员会、西南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在中国重庆西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近100名代表,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观背景,围绕战时经济、社会、政治、对外交往及国际关系、军事、文化、抗战大后方等几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战时外交及国际关系研究持续推进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在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也在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研究与抗战的胜利、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均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该领域一直以来就是抗战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也曾对这一主题进行过专题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本次会议来看,相关与会论文共计14篇,学者们或从双边关系,或从多边关系,或从利用新刊史料,或从探讨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对战时外交及国际关系的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40年代后期,中共对美政策似乎经历了一个循环,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开始,历经争取与美国友好合作,最终又回到反对美帝国主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革命时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一文,对革命时代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分析和探讨了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

有关中美合作所的研究,近年来已逐渐摆脱军统人员如沈醉回忆录的限制,采用台湾“国防部”内部资料和“国史馆”典藏的档案文献,做出了相对较为持平的结论。台湾“国史馆”吴淑凤纂修的《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泰越的工作》一文,利用“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新解密的部分档案,通过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泰国、越南工作的检视,来分析中美合作所成立前后中国与泰国和越南的关系,进而探讨此时中美合作所在泰、越的作为。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教授《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群调整中日关系的努力及其策略》一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群面对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所做努力及其具体策略的分析,认为张群虽被国民党内及社会上不少人视为亲日派的一员,执行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但他在外交部长任上的所作所为,与他的前任是有明显区别的,在谈判中也未对日本作出任何明显让

步。1938年武汉保卫战之际,具有特殊意义的“保卫马德里”口号,引起了国共两党的共同关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tephen Mackinnon (麦金农)教授“Baowei Madeli (Defend Madrid): China Connection”一文指出,这一口号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将其比作中国的持久战,鼓舞军民士气;二是服务于国内外媒体宣传,将中国抗日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引起国际同情及支持。

此外,重庆大学杜俊华副教授《论抗战时期史迪威与宋子文关系之嬗变》一文对战时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剖析;韩国济州大学郑炯儿讲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对国民政府外交成果的再考察》一文,以国民政府和美国关系为讨论对象,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进行了重新思考;西南大学熊斌博士后《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论》一文梳理了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并就其战时的历史贡献作了简要评价。

中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及日本的日中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有极其广泛的参与面,无论是英国、美国、苏联等战时大国,还是印度、韩国、越南、缅甸等殖民地国家,均参与其中。同样,对中日战争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中日两国的视角,而应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学者的参与。

中日战争时期,韩国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组建光复军,开展抗日斗争。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教授《韩国人的中日战争——1941年前后时期韩国光复军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一文,以当时韩国光复军出版的两种主要刊物《韩国青年》、《光复》作为研究对象,对刊物中有关国际形势的认识及其如何发展演化的过程进行了集中分析,从而揭示了在抗日战争中最具转折意义的1941年,韩国独立运动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韩国、中国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认识。

印度在中日战争中扮演了多重且复杂的角色。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所 Madhavi Thampi 教授在“India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一文中,从印度反殖民运动来看中日战争对印度的影响,指出中日战争对印度民族运动兴起,印中、印日等多边国际关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认为战前中国往往向东看,而在战时则有向西看的必要,此时的中印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西藏地区的战略地位因战时中印运输路线开通而日渐突出,为以后中印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认识与评价国际审判的意义,与处理新的战后国际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研究员的《东京审判与“东京审判史观”——关于东京审判研究的方法论考察》指出,在东京审判问题的研究上,至少需要厘清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基本判断,需要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战后国际形势的需求、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谴责的大方向的角度进行把握、认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二是在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的攻击上,需要科学地把握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本质;三是要准确地认识到美国在东京审判中所存在的缺陷。

另外,宁夏大学张天政教授的《1940年前后英、法扣留我外运偿债货物引起的交涉》一文,通过对1940年英法扣留中国外运偿债易货事件的分析,揭示了战时中国易货偿债的曲折历程,也弥补了战时中英、中法经济关系研究的不足;荷兰学者、西南大学 Vincent Chang (张克雷)博士“Revisiting wartime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of a global power in the making”一文,通过对战时外交官、军事专家、记者、特殊组织等在华活动的梳理分析,从内在视角去展示在当今西方社会几乎被遗忘的战时中国首都重庆的国际性,以及重庆拥有的独特的历史遗产。重庆市档案馆唐润明研究员《二战时期中国政府首倡同盟国家联合作战及其评价》一文,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主动倡导同盟各国联合作战的种种努力。日本东京大学吉井文美博士《日中战争下的开滦煤矿》一文利用英国、中国及日本有关开滦煤矿的史料,从政治外交史的视角探讨了战时开滦煤矿特殊的多元博弈。

二、战时经济社会研究不断深入

战时经济社会研究,历来是抗战史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就此次会议来看,该方面论文达16篇之多,约占与会论文总数的25%。在战时经济方面,有考察战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有关注战时银行变迁的,有剖析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还有定量分析战时对外贸易的,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战时经济方面研究的深入。战时中国经济包括沦陷区和大后方两个部分,以往分述较多,合论较少,即较少将战时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在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久保亨教授《战时中国的工业发展》一文,综合考察战时中国各地工矿业动向,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过程的理解。该文指出在1938—1942年间重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工矿业生产持续增长,支撑了中国的抗战力量;在1938—1940年间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华北、华中等地,为支撑侵略战争,日本也致力构筑战时经济体系。1941年后,全国范围内的工矿业生产均呈现出下降趋势,1943年后尤其严重。他同时也指出战时新设或增强的生产设备及随之产生的技术转移,多数为战后的中国经济所继承。

日本成城大学林幸司副教授的《日中战争与重庆银行业》一文,探讨了日中战争时期重庆地区银行的环境变化以及各银行业的应对过程;西南大学张朝晖副教授《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对县银行的制度建设与困境述论》一文,以县银行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20世纪40年代为例,论述了国民政府对县银行的制度建设与困境;韩国仁川大学金志焕教授《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一文,以实施棉业统制政策的农本局为中心,对战时国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分析;日本群馬大学今并就稔副教授《日中战争初期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国民政府》一文,对中日战争时期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日本大阪产业大学木越义则副教授《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一文,以重庆海关总税务司贸易资料为中心,对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数额进行了定量分析。

在战时社会研究方面,有关注下层民众的,有分析边疆工作人员的,有诠释民间战争记忆的,有剖析难民垦殖计划的,还有论述战时红十字救护总队的,学者们眼光下移,推动战时社会方面研究不断深入。关于中日战争期间或在之前来华的日本人的研究,除了满洲移民和出征士兵外,较少受人关注,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小林元裕教授《中日战争爆发和华北的日本侨民——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一文,以中日战争爆发前居住在北平、天津的日本侨民为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究了在华日本侨民是如何面对战争、如何被动员的,加深了对战时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认知。

关于中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研究,少有从国家与民族、社会关系视角的探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岛田美和博士在《战时的边疆政策——围绕“边疆工作人员”的形成》一文中,利用台湾中研院农林部档案、朱家骅档案以及《边政公论》、《中国边疆》等文献资料,聚焦战时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讨论了战时围绕边疆问题展开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前后,记忆史研究在中国兴起,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唐凌教授在《关于日军侵占桂林及周边地区的民间记忆——以广西灵川县定江乡为考察重点》一文中,运用记忆史研究方法,从“逃难”、“日军抢夺、破坏、屠杀”、“民众人性”、“日军败退”四个方面介绍了民间的历史记忆,分析了这些记忆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并从下层民众视角,对日军的所作所为以及民众在抵抗日军侵略中的表现、意义进行了评价。

此外,美国布朗大学Rebecca Nedostup(张倩雯)副教授“Pacification or Mobilization? The problems and uses of wartime refugee settlements”一文,基于战时、战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如何塑造

乡识、乡情及家的归属感的问题意识,从1937—1959年的较长时段来考察难民垦殖计划的多重性质;苏州大学戴斌武博士后《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防疫工作述论》一文,对战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防疫工作进行了梳理,探讨了救护总队开展防疫工作的努力以及实施防疫措施所取得的效果。

三、战时政治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战时政治研究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点领域,论文共计9篇,分别从政治人物、跨国组织、国家与民众、中共发展、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对战时政治人物研究,蒋介石研究仍是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利用蒋介石的个人档案、文电、日记等资料,从多角度对蒋介石进行了研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在《蒋介石与抗战初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一文中,通过考察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动员理念、国民政府有关总动员实施机关变迁及其法制工作之进展,探讨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构建总动员体制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自进研究员《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一文,聚焦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国际社会认同的角力过程,以及蒋介石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政策,丰富了学界对此一阶段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认识。

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赖小刚教授在“*What concerned Chiang?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Chiang Kai-shek's wartime diaries*”一文中,利用统计学及文本分析方法,对蒋介石日记内容进行归类分析,勾勒出蒋在战时所关注的焦点内容。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一文,围绕蒋介石的对苏观、对德观、日德关系观、苏德关系观,蒋介石何时预测到苏德关系变化,蒋介石如何应对苏德战争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详细剖析了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

在跨国组织、国家与民众、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英国牛津大学 Rana Mitter (米德) 教授在“*Imperialism,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war China: UNRRA in China 1944 - 1947*”一文指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短暂经历表明,中日战争的影响持续存在,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带来挑战和机遇,同时也改变世界对民族国家的态度。一方面,二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侵略斗争,同盟国的胜利为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可能;另一方面,战争也强调了构建跨国组织的紧迫性。同时,要理解战后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就有必要了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工作的进退维谷、冲突纠纷、协同合作是了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途径。

抗战时期,中国国内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体系,但原有利益空间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国家、基层和民众仍为国内利益空间的三大结构。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战时特殊利益空间中的国家、基层与民众——从抗日战争时期兵役推行侧面切入》一文,以四川县级档案馆藏战时档案为基础,从征兵问题及抗战荣军养护问题切入,阐论抗战时期中国利益空间中国家、基层与民众三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图说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直接利益任何时候都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构成中起到决定作用,超越直接利益的行为取向只能通过政治和观念整合造就,而这种整合涉及社会文化更新,对其难度必须有充分认识。

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向华北出动,并快速发展起来。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战前该地区的特殊局面、战时战场形势及中共策略均有密切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抗

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一文,以省为单位,从中共进入的方式、不同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相关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中共势力在华北的发展壮大。

此外,日本津田塾大学中村元哉副教授《战时中国的宪法制定史》一文以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为分析对象,对战时中国宪法制定史进行了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萍编审《1942年蒋介石裁冗移民令的缘起与流产》一文结合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所藏档案,对1942年蒋介石裁冗移民令的背景、计划与措施进行了全面论述,并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流产的原因。

四、抗战军事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抗战军事史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颇受学者们关注,这次会议也不例外,相关论文共计11篇,有新方法的尝试,有新视角的探讨,有新史料的挖掘,还有老问题的新解读,均从不同侧面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院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教授在“Towards a new military narrativ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主流的抗战叙事是从“中国是受害者”及“抗战爱国民族战争”两个方面来解释抗战史,这在一定程度会影响抗战的描述或叙事,因此,他尝试着运用一种新的军事叙事方法描述抗战,即通过对战时一些重要战略、战役,如国民党的游击战、焦土战,日本的“一号战役”,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梳理,客观地分析中日战争。

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从军事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关于兴亚院的历史定位》一文,从回应《日美关系史——开战前十年》作者海因理克斯提出的战争诱发内在理论切入议题,围绕兴亚院设立的背景及过程中日本政府内部、政府与陆军海军、陆军与海军、陆军中央与现地军队之间的种种利益考量与争夺展开论述,分析得以支持日本方面作出决定及判断的内在理路。

日本上智大学笹川裕史教授提出从“总力战”(total war)视角来审视20世纪之中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二者关系的视角。他在《中国的总力战与基层社会——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朝鲜战争》一文中,以出征士兵家属的援助工作为焦点,考察中国基层社会在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朝鲜战争等战争环境下所引发的种种变革,并在与被置于同样总力战环境下的日本社会的对比中,对这种变革进行了简要地评价和定性。

抗战时期中日空战已有不少研究,但是基本上限于全面抗战时期。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事航空力量的崛起与对华初战》一文,着力关注20世纪初日本军事航空力量的发展,认为30年代初日本航空军事力量对锦州与上海及周边城市所实施的较为成功的作战与空袭行动,更加刺激了日本发展军事航空的欲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深感此种作战方式的威胁,逐步开启了应对日本空袭的各项防空举措。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武器援助是一个历史悬案,多年来,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学界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说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孙艳玲副研究员在《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一文中,利用俄罗斯、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文献,发现了一些极具价值的线索,初步认定抗战前期苏联确曾秘密援助中共武器及军事装备,不过数量极少,作用有限。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与德国军队战争暴行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新颖而又着力不多的课题。有西方学者从确认纳粹暴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暴行的立场出发,否定这一课题的价值意义,认为两者不可比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铎研究员则在《二战时期德日军队大屠杀罪行

比较初探》一文中认为,纳粹屠犹与日军的在华暴行是两个并存的客观事实,既然都是同类的战争暴行,就可以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客观上两者存在着性质的差别,也应通过比较研究而不是武断地进行事先的结论与否定。

台湾“国史馆”的张世瑛《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再认识——以忠义救国军为例 1937—1941》一文,在新近公开的戴笠史料、“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国民政府档案以及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及第三战区档案等重要原始档案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由戴笠及军统局所建立的忠义救国军。

武汉大学李少军教授《论抗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文,基于该部队的由来、何以成为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发动战争得力工具的问题意识,考察抗战前该部队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历程,并分析其形成及特点。西南大学谭刚副教授《1944年四川的“特种工程”与对日轰炸》一文,运用中、美、日三方资料对“特种工程”的修建原因、使用进行探讨,并对其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台湾“国史馆”萧李居助修《应战不求战: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和战抉择》一文由中国军队的部队整编与饷械问题以及华北地方实力派的态度问题出发,分析中国方面的顾虑,以理解采取不求战态度的因素,并阐明“应战不求战”立场与方针对事变处置所造成的影响。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王文隆的《战时中国国民党在澳门的情报工作 1941—1945》一文,以收藏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史料为核心,梳理了战时中统在澳门的情报工作,从而拓展了抗战军事史的研究领域。

五、抗战大后方研究引人关注

从2008年以来,重庆市实施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次研讨会上,有关抗战大后方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达20余篇,约占论文总量的30%。从学者构成来看,除了中国学者外,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荷兰等国学者也广泛参与其中。从研究议题来看,研究领域呈不断拓宽、深入的趋势,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育、艺术、社会生活、城市、交通等众多方面,标志着“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板块”的正式形成。

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周勇教授《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针对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缺失,对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对象、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价值、抗战大后方的地位与作用等涉及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西南大学潘洵教授《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调查统计研究》一文,针对过去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调查统计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用实证的方法详细考证了日军轰炸重庆造成的人口伤亡人数,力图得出日军轰炸重庆造成的最低人口伤亡数据。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内田知行教授《战时陪都重庆市的市内交通系统》一文,对战时的重庆市内交通系统进行考察,以图弄清当时的交通系统是如何保证战时居民出行的,论述了战时陪都重庆市内交通系统经历的从“传统人力交通工具”到“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缓慢变化。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民生公司与战时重庆的发展》一文,从抢运宜昌滞留物资、促进后方企业发展、乡村建设、企业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民生公司在战时重庆发展中的作用。重庆大学张瑾教授《废墟上的“救赎”: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一文系统梳理宋美龄在应对大轰炸的实践活动,并讨论了其塑造的战时首都抗战形象及其意义。重庆社会科学院李重华研究员《积健为雄:抗战时期陪都体育赛事》一文,对战时重庆的体育赛事作了细致介绍和论述。

西南大学刘志英教授《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保险业述论》一文,对战时大后方保险业的发展及主

要业务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抗战大后方保险业的特点及其作用。西南大学吕进教授《研究大后方抗战诗歌的五个向度》一文,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该项研究应该如何着手及主要研究对象问题。西南大学张守广教授《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后方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一文,考察和分析了战时中国大后方地区现代工业进程的启动和初步发展的情形、特点、意义及局限。西南大学张武军副教授《抗战文学书写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一文,分析了八年抗战期间重庆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西南大学赵国壮讲师《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一文,基于对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战时融资活动考察,从行业融资角度来分析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情况。西南大学耿密博士《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跳厂问题论析》一文,以重庆地区为切入点,对战时后方工人跳厂问题进行了探讨。西南大学李俊博士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推广及其影响》一文,分析了抗战大后方农业推广的兴起及影响。

六、战时文化变迁研究与档案文献整理进一步拓展

日本广岛大学水羽信男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以战国策派为中心》一文以战国策派林同济、雷海宗、陈淦、沈从文等人为分析对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西南大学凌承纬教授《艺术大家、和平卫士、文化使者——论张书旂》一文,探讨了抗战时期著名国画家张书旂的艺术成就和对抗战时期的独特贡献。西南大学虞吉教授《“〈木兰从军〉陪都被焚事件”的史论新解读》一文,重新解读了抗战时期电影《木兰从军》被焚事件背后交织的历史及现实缘由。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本次会议有三篇文章关注抗战档案文献。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宋玉武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日战争(1937—1945)文献》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各部所藏各类中日战争文献资料。重庆市图书馆任竞、唐伯友先生《胡佛研究所馆藏抗战档案文献现状调查及概介》一文,从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个方面对胡佛研究所馆藏抗战档案文献进行了调查。重庆市图书馆王志昆研究员《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建设述略》一文,对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文献中心的成立、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丰富了与会学者对相关馆藏抗战文献的了解和认识。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在开幕式中所言,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对于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增进学者友谊具有重要意义。而此次会议的召开,还成功地完成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的承前启后与薪火相传,一批青年学者参与到国际共同研究中来,表明后继有人,对于推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者潘洵,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赵国壮,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高士华)